

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与长安学

李 强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又为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所关注,其形成的原因、历史客观规律及发展前途非常值得探析。分析认为,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长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传统文化、频繁的中外文学艺术交流等因素,促使长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关键词:长安;长安文化;长安学;华夏文明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3-0001-09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居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华夏文化,其中历时一千多年的十三朝古都长安及其传统文化最能吸引人们的视线。在中国版图的中心地带、华夏民族母亲河黄河中游以及巍峨壮观的秦岭山脉以北的关中平原上,有一座自古被称为“帝王之都”的历史古城,即陕西省西安市,也就是中国十三个封建王朝的都城长安。

长安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西北方的黄土高原诞生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东北方的中原地区为华夏先帝尧、舜、禹铸造的富庶之地,秦岭之南、黄河之西则是广袤的各民族生活繁衍活动天地,依此为轴心,向周边辐射,传递着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信息。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又为世界各地专家学者所关注,其形成的原因与历史客观规律及发展前途非常值得探析与研究。

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运动的激励下,近年

来,陕西省学术界对历史地域文化的讨论十分活跃与热烈;相继邀请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和各地研究部门的专门人才来到西安市兴致勃勃、汇聚一堂,参加一系列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长安文化”、“长安学”、“长安文学”的探讨和研究。

一、长安文学、长安文化与长安学

中国人对“长安”一词应该是耳熟能详,长安二字,意味着长治久安、长远平安,充满了友好、祥和的祝福。

长安曾是十三个封建王朝都城;读过汉赋、唐诗、先秦诸子散文的人,有谁不为周、秦、汉、唐诸朝诗文大家的才华所倾倒;这里又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策源地之一,还是横亘亚、欧、非洲陆路、海路“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中华多民族古代文学艺术的集散地之一。

在古都长安周围,有诸如半坡、姜寨、兵马俑、汉

收稿日期:2011-05-08

基金项目: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李 强(1950-),男,甘肃兰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阳陵、华山、大雁塔、小雁塔、华清池、乾陵、茂陵、法门寺等顶级的国家历史文物,另有历代王朝和关中平原民间遗存下来的无以数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切都雄辩地证实了进行“长安文化”学术研究、创立“长安学”的必要性。

令人振奋和欢欣鼓舞的是,2008年11月在省内外专家学者和有志之士的支持和协助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受教育部“211”重点学校工程重大项目的委托,设计和实施“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课题,在西安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大高校和各地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就“长安文化”、“长安学”的学术界定、内涵、外延、研究方法、发展前景等问题献计献策,给与与会者莫大的启发和激励。

在此次大会上,学者朱利民发表《长安·长安文化·长安学》的学术演讲。他指出,当今举国上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种大好形势为构建长安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认为:“就人类文明的起源而言,周、秦、汉、唐的长安既是世界物质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头和中心。”经他论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视野的长安学,是地域文化发展的理论自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视野的长安学,是从文化比较和文化功效的层面重新审视长安与华夏诸多民族文化关系的需要。”

文艺理论家肖云儒在《长安文化与长安学》的学术报告中,以1924年鲁迅来西安易俗社5次观看秦腔《双锦衣》后给剧院提笔挥墨题写“古调独弹”4字为话题而谈起,从“地理区位”、“历史沿革”、“精神流脉”等3个层次来条分缕析长安文化和长安学。他高屋建瓴地指出:“长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全息性和辐射力。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和主体。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长安学’不但是‘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历代对我们民族和历史的研究,都为‘长安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与此同时,参加中国第3届“长安雅集”大型文化活动的海内外学者纷纷聚焦“长安文化”,并对“长安学”的发展寄予厚望。其中王巨才、文怀沙、

霍松林、舒乙、刘庆柱、方光华、赵世超、肖云儒等著名学者纷纷发表精彩言论,对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李炳武首倡的“长安学”集思广益、献言献策。著名教授霍松林认为,“把长安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内涵之丰富,非浅尝辄止所能涵盖。”

李炳武先生还认为:“盛世文化是长安学研究的核心所在,时代关怀是长安学研究的特点,而开放包容、创新进取则是长安学研究所必须秉持的精神。……长安学应该是一门综合学科,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思想、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方面内容,遍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地理学、经济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田文棠教授对“长安学”作出确切的概念界定,并厘清其基本的文化内涵。他明确指出,构筑或打造国际化的“长安学”文化品牌,应从中国文化的源流发展及长安古都作为周秦汉唐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来审视。“长安学”是由周公姬旦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在“丰、镐、长安”最早创建并逐步加以实施的“长安礼学”;应该说《尚书》《诗经》以及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周礼》《仪礼》《礼记》等礼学“三礼”,乃为“长安礼学”的基本元典。

在周秦汉唐社会转型、文化重组的时代背景下,“长安礼学”又不断延伸、不断拓展,以至形成了两汉时期儒家和道家既长期并存、又互黜互补以及盛唐时期多元互动、“三教同一”的文化发展格局。“长安礼学”有力地推动着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基本的原生形态的文化要素和文化理念。所以,“长安学”就是“长安礼学”,或者说是此门学问的延伸与扩展。

又有学者认为,从概念的内涵来讲,“长安学”与“长安文化”既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它们既有相互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因为“长安文化”是一个包含长安古今文化在内的地域性文化概念;而“长安学”所涵盖的虽然只是周秦汉唐时期1800多年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却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人文主义的构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更有专家主张,古都长安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不

仅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中心,而且也曾是亚洲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我们要把长安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就得首先确立研究的对象。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名城——古都长安,为我们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创造了周秦汉唐灿烂文明的长安大地上,我们完全有条件、也应该建立一门长安学。

对长安学的研究不是从近几年才开始的,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起,已有相当一批学者注意到长安学研究的重要性。经过老一辈专家学者多年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对于长安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为今后的继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除了传统的存世文献之外,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碑石墓志资料也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方便。著名历史学家史念海先生和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率先而行,编纂出版“古长安丛书”,由史念海先生担任主编,三秦出版社负责出版;相继推出了《隋唐两京丛考》和《三辅黄图校注》,为长安学研究做了一些扎实而必要的基础工作。

21世纪初,三秦出版社出版了《长安史迹丛刊》,在以前出版过的相关书籍基础之上,又组织编写了一套全新的学术丛书,即《类编长安志》、《西京杂记》、《三辅黄图校注》、《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三辅记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关中佚志辑注》、《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佚》、《游城南记校注》、《南山谷口考校注》、《隋唐两京丛考》10本、14种书。这套丛书基本上概括了古代关中尤其是长安地域文化的重要典籍,其总序仍采用先前史念海先生原撰之文。

在此套长安学重头书籍的《总序》中,史念海先生对长安文化研究丛书有一个长远的设想:“当前党和政府组织各方力量整理古籍,允为一代盛事。‘古长安丛书’也得在这盛世开始编纂,早日克奏肤功,是各方共同的期望。由于前贤有关著述相当繁多,‘古长安丛书’拟分集编纂,近人撰述亦往往有涉及古长安的,自应一并收录,俾究心往事者,不必多所问津。初步斟酌,分成五集:甲集、整部撰述,或后世的辑本;乙集、专篇撰述,或由其他著作中节录的有关篇章;丙部、记游撰述而集成专著者;丁集、诗词歌曲;戊集、近人专著。如前所说,有关古长安的

撰述,由于传世已久,难免多所讹误,且刊本较多,间有相互参差之处。故整理时,务须详加校勘注解,俾使章节句读的斟酌,字词义例的阐释,篇章段落的分析,情绪思想的反映,皆能有所显现。这都是整理古籍的基本功夫,无容多所赘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先生对“古长安丛书”所作的大致勾勒,因多种原由,虽未付梓,先生之愿未遂,但这些构想对我们今天开启的“长安学”研究,无疑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参考。

其时隔若干年后,由崔林涛主编的大型丛书《古都西安》继续论证和实施宏大而务实的学术构想。在此套书的“总序”中,他对共同策划、“主要审定”的史念海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认为此书是“史念海老先生留给世界,留给当代与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并深情地赞誉道:“‘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城。’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发源地之一。……‘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

关于“长安学”,在此之前国内屡有人提及,多有论证。2000年春季在《人文杂志》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就有专家学者提出了创建“长安学”的理念。2007年在“西安碑林与碑刻研究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又一次提出了建立“长安学”的构想与期望。

关于中国文学与长安文化之间的关系,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在关注、研究,并付诸于学术实践,在他们编撰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时,涉及到古代文学艺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周秦汉唐诸朝代的著名作家与传世作品的。不过遗憾的是,论及长安文化与历代长安都城文学,大都杂糅和镶嵌在各类文化与文学通史之中,似乎缺少有分量的此类专史与学术精品;也鲜见中原汉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学交流的篇幅较大的学术专著,尽管历史上此地与边疆四夷地方政权发生着极为密切的文学关系。现当代专家学者也缺少与域外乃至世界文学交融的观念,较少以丝绸之路为载体将长安文化研究延伸到东西方各国去。

由此,我们应该对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进行全

方位的研究与探索,努力改变和更新中国文学、历史学的观念,尽快弥补昔日欠缺的工作。

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长安所在之渭河平原,位于渭河北山与秦岭之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长达 360 km,方圆 $3.4 \times 10^4 \text{ km}^2$,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在这一狭长的内陆平川上,地理位置平坦如砥,关隘林立,易守难攻。南、西、北三侧皆为山脉环绕,东有黄河天险,周围仅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金锁关等峡谷隘口与外界联系,故称“关中”。长安古城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地处渭水之南,秦岭之北,依山傍水,披岭带河,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统治虽然东移,但长安仍处于控扼西北、兼守西南、屏蔽中原的重要位置。

论及自然环境和条件,由渭水冲积而成的关中平原气候温润、雨量充沛,特别是今天西安附近,密集的河流一般都有比较充沛的水量,这就是后来为人津津乐道的“八水绕长安”。“八水”即泾、渭、泾、灞、沣、镐、潏、涝水,除渭水外,汇入渭水的泾水也是比较大的河流,因为二水含泥沙量不同,所以在它们的交汇处,水的颜色深浅不同,这就是“泾渭分明”的由来;灞水在长安以东,既是长安的一道安全屏障,也是长安的水源之一。这些河流滋养了关中大地,也成为后来维持“帝王之都”长期存在的重要条件。

此地地理位置、气候、土质条件、居住环境都十分优越,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定居农业,并因而形成了集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原始定居点。在新石器时期的后期,原始村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渭水两岸村庄密布,根据今天考古的发现情况来看,在关中地区共发现新石器晚期的村落遗址 35 000 多处,有些地方的原始村落密度甚至比今天的村庄密度还大。闻名中外的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就是一个距今六七千年的原始村庄遗址。

至于古代先民为何将“长安”定为首都,这需要查阅一些古书典籍,并清楚了解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周边地区的地理文化。

元代洛天驤在《类编长安志》卷一《总序》云:“长安,厥壤肥饶,四面险固,被山带河,外有洪河之

险,西有汉中、巴、蜀,北有代马之利,所谓天府陆海之地也。……自周、秦,历汉、唐、西魏、后周、隋、唐为帝都,以为奥区神皋之地,信乎。”“长安,古之都会也。自周、秦、汉、唐,魏已降,有国者多建邦于此。所以山川之形胜,宫室之佳胜,第宅之清胜,丘陵之名胜,为天下最。”^[1]

“长安”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大西北各省、自治区的核心。从先秦至汉唐,长安分别称“雍州”、“关中”、“三秦”、“三辅”、“京兆”等。

《三辅黄图》卷一云:“《禹贡》九州岛,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古丰镐之地。”《禹贡易知编》云:“今陕西凤翔府西北有雍山,雍水出焉,雍州之名以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2]《晋书·地理志》载:“周自武王克殷,都于丰镐,雍州为王畿。”

明代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卷 52《陕西》载:“周都丰镐,则雍州为王畿;东迁以后,乃为秦地,孝公作为咸阳,筑冀阙徙都之,谓之秦川,亦乐关中。”雍州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辖境相当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以及青海黄河以南一带。其后逐渐减缩,唐辖有今陕西秦岭以北,乾县以东,铜川市以南,渭南以西地,为关内道治所。开元元年(713)改为京兆所。

论及古代“长安”与西北地区周边发生密切关系的地理区域,诸如“朔方”、“陇右”、“河湟”、“河西”、“西域”、“居延”、“安多”、“河套”等地,由此发生和演绎了一场如诗、如画、如泣、如诉的中华民族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壮剧。

据考古发现,地处黄河中游的“长安”及关中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其历史文化非常悠久,旧石器时代大量文物的问世即可证实这一点。诸如 1963 年至 1984 年,科学工作者在此地蓝田公主岭等地发现了早于北京猿人 20 万~30 万年的远古时代的古人类化石,距今 80 万~100 万年,取名为“蓝田人”。1980 年又在大荔解放村发掘到距今 20 万年的人类骨骼化石及其一批旧石器,命名为“大荔人”,并在这一带发现和命名大荔“沙苑文化”。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前仰韶文化”的出土,以长安芦坡头、何家湾、华县的老官台、元君庙,临潼的白家、宝鸡的北首岭等地为代表。后来又发现了最有地方特色的距今 6 000~6 800 年的“半坡文化类型”,距今 5 000~6 000 年的“庙底沟文化类型”。

据周伟洲教授《陕西通史·民族卷》评述:“在众多的半坡类型遗址中,特别是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最具有典型性,且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母系氏族社会繁荣发达阶段人们共同体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资料。”诸如“陶器上有各种彩绘文饰,有的还有简单的文字刻画符号等。”至于“姜寨遗址,则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聚落基址。——姜寨遗址出土的石器、彩陶等,与半坡遗址属同一类型,而略有进步。”^[3]继而此地出土的是距今约4 000~5 000年的“龙山文化类型”,亦称“客省庄二期文化”,如西安的米家崖、长安的客省庄、岐山的双庵、临潼的康家、西乡红岩坝等地。从大量的出土人骨和陪葬品来测定,这里生活的人类体质特征均为蒙古人种。据人类学家韩康信考证:“从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体质上种属特征发展的基本序列是沿着蒙古人种特征的发生和发展展开的,还没有发现西方欧洲人种和尼格罗人种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成分中起过多少作用”^[4]。

对夏商周时代此地的考古发现,人们可知古代秦岭、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形成之地。如宝鸡贾村问世的周成王时期的典文《何尊》中即有“宅兹中国”的字样,《尚书·梓材》中亦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之记载。西周古文中称关中、伊洛平原为“中土”,所谓“宅天地之中”。《说文·华部》称此地兴起的“华”、“夏”族为“中国之人”。《尚书正义》一书释“华夏”一词为:“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

早在黄帝时期,中华民族的始祖就活动在秦岭与黄河流域地区,相传他指导黎民百姓“治五气”、“始陶器”、“艺五种”、“制乐律”、造车辆、养蚕作衣等,又与邻近的炎帝结成华夏氏族联盟,与蚩尤为代表的域外敌对势力展开昏天黑地的战争,从而赢得了大量的土地和国民。据《史记·周本纪》记载,黄帝曾孙“帝喾元妃姜原履巨人迹,而生子启”。及启长大,好耕农,舜封其于今关中地区武功西南之“郃”,号曰后稷,姓姬氏。

在夏、商时期,古代陕西地区亦为炎黄子孙的主要活动之地。夏自禹开国,约在公元前2140年,至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中心地区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所谓“王畿”,即后来统称的中原地区。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禹死后,其子启即位,“与有扈氏战于甘,作甘誓。”

此书中的“甘”就指今西安西南的户县。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华县沙村遗址挖掘,就发现了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相类似的夏代文化遗址。

商代自汤开国,时年为公元前1711年,至纣灭亡,共传17世,31王,历时600多年。在商境内,特别是在河南北部的殷墟和关中的周原问世的大量甲骨文,充分证实了这里华夏民族群落的发展和壮大。据《建国三十五年来陕西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中披露,关中地区发掘的“西安田王”、“蓝田怀真坊”、“铜川三里洞”、“岐山京当”等地都有商代“龙山文化”出土^[5]。

周指称古部族名和朝代名,言及周族始祖后稷,原居郃(今陕西武功),传到周族领袖公刘时,率族人迁到豳(今陕西彬县东北);又至周太王古公亶父,因戎、狄族的威逼,携众迁徙至岐山下的周(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郭家室,设立官府吏治,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得周族日渐强盛。

商末周族领袖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攻灭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邶(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北)等国,并以丰邑(今陕西长安沣河以西)建立国都。至其子周武王联合诸族,率众东征,经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战,取得大胜,遂灭商,正式建立西周王朝,建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即汉唐时期的长安。在此期间他雄才大略,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分封诸侯,发展生产,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也使中华诸多民族文明程度得到加强。

三、中华民族文化的奠基地

海内外华夏民族的子孙都认同自己的祖先是黄帝与炎帝,在西北秦岭与昆仑山脉一带,流传着许多与长安文学、艺术有关联的远古神话传说与故事,说明此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地。涉及到历经十三朝风雨浸泡的长安古都的称谓与沿革,就必然需要梳理其行政区域在历代的沿革变故情况。据《辞海·历史地理》提供的有关“长安”的学术文字:“长安:我国古都之一。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七年定都于此。此后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西汉绿林、赤眉,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

建都于此。”

再结合有关“西安”的文字介绍:“西安:府名。明洪武二年(1369)改奉元路置。治所在长安、咸宁(今陕西西安市),辖区相当今陕西彬县、周至以东,铜川市、韩城以南,镇安、山阳、商南以北。清朝版图缩小,相当今周至、铜川市、渭南、宁陕间地,明清时为陕西省省会。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建为西京。汉唐时为区分两京,时称其为西京。”我们由此可得出西安作为世界历史名城发展变化的清晰脉络。

若再仔细追究,可以看到尧舜禹、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在秦岭以北、黄河以南之间关中大地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沿革发生巨大影响的诸多历史事件。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曾、犬戎等攻周,杀周幽王,西周灭。后有周平王率周族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依靠晋、郑两国夹辅建立东周。至此而揭开战国诸侯称雄,争相角逐的帷幕。春秋因鲁国编年史《春秋》得名,一般以周平王元年(前770)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春秋时代。战国因诸侯国之间连年争霸,发动战争而得名,西汉末刘向编撰《战国策》始作时代名称。一般以周元王元年(前475)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中国为止,为战国时代。

春秋初期,在关陇平原和山地活跃着诸多的不可小视的地方政权。诸如“郑”,开国君主是周宣王弟郑桓公。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后郑武公即位,先后攻灭邰和东虢(今河南郑州西北),建立郑国,都新郑。“虢”,西虢,建于西周,开国君主为周文王弟。西虢亦称城虢,在今陕西宝鸡东。西周灭亡后,支族仍留原地,称为小虢,公元前687年为秦所灭。“芮”,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在今陕西大荔朝邑城南,公元前640年为秦所灭。“秦”,古部落名或古国名。相传嬴姓部落为伯益的后代。自非子做部落首领时,居于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善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今甘肃张家川东),作为附庸。传至秦仲,周宣王命为大夫。毋庸置疑,“秦”是诸国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古国。其开国君主是秦庄公子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王室分封为诸侯。襄公子文公击退犬戎,居地岐山以西。春秋时建都雍(今陕西凤翔东南),占有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秦穆公曾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力增

强,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昭王时不断夺取魏、韩、赵、楚等国地。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建立秦朝。

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此时的秦帝国疆域东南到大海,西到今甘肃、四川,西南至云南、广西,北到阴山,东北到辽宁。秦二世元年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公元前206年为刘邦领导的起义军所灭。秦朝虽然只经历了15个春秋,但奠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千秋大业。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灭秦,后来又打败楚霸王项羽,在公元前202年称帝,建都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汉朝。历史上称为西汉或前汉。疆域东南至大海,西到中亚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葱岭,西南至云南、广西,以及越南北、中部,北到大漠、蒙古高原,东北蜿蜒伸展到朝鲜半岛北部。汉武帝时成为亚洲最繁荣富强的多民族国家,并与周边地区各国建立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初始元年(8),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国号新,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曾进行复古改制。天凤四年(17),爆发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25),远支皇族汉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朝,建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历史上称为东汉或后汉。至延康元年(220)曹丕称帝,东汉灭亡。汉代共历24帝,统治406年,其中前汉共历12帝,统治210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各民族封建统治政权中,较为出名的有后赵(304~329年)、前秦(350~394)、后秦(384~417)、西燕(384~394)。

北朝十六国之一前赵,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汉王,公元308年称帝,公元309年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公元310年刘聪即位,公元316年灭西晋。公元319年其侄刘曜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疆域有今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各一部分,公元329年为羯族姓氏后赵所灭。

公元350年氐族贵族苻洪称三秦王。公元352年其子苻健称帝,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史称前秦。公元357年苻坚即位后,灭前燕、前凉及代国,曾一度统一北方,公元383年经历了淝水大战,淝水之战失败后,原被灭各国及各族首领纷起立国,公元394年为后秦所灭。

公元 384 年羌族贵族姚萇称王灭后秦,公元 386 年称帝,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国号秦,史称后秦,有今陕西、山西、甘肃、宁夏一部分,公元 417 年为东晋刘裕所灭。

西燕为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慕容氏所建政权。淝水大战后,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与慕容垂争夺恢复燕国的领导权,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公元 386 年,慕容永迁都长子(今山西长治南),史称西燕,394 年为后燕所灭。

在此历史阶段,中国北方各族地方政权纷纭林立,长安古城也多为少数民族上层贵族所统治,故此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交流较之其他朝代更为频繁。

自公元 420 年东晋灭亡到公元 589 年隋统一中国的 170 年间。中国历史一直处于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此阶段在关中平原叱咤风云、建立国家政权的有北周(557~581)、隋(581~618)。公元 557 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国号周,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北周。公元 577 年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 581 年为隋所代,共历 5 帝,25 年。

公元 581 年,隋文帝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开皇三年(583)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后灭南朝陈,统一全国。疆域东南到大海,西到今新疆东部,西南至云南、广西和越南北部,北到大漠,东北至辽河。公元 617 年太原留守李渊乘农民大起义之机起兵,攻克长安。次年隋灭,共历 2 帝,38 年。

汉唐时代,长安又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西汉时长安城内有专为外国人而设的居住区,唐侨居长安的外国人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大食,多时数以万计。故城有二:汉城筑于惠帝时,在今西安市西北,周围 25 km;隋城筑于文帝时,号大兴城,包有今西安城和城东、南、西一带,周围 30 km。唐末天祐元年(904)迁都洛阳后,因城中民房大半被拆毁,就旧城北部改筑新城,即今西安城。杜甫《秋兴》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唐太宗《帝京篇》云:“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营遥接汉,飞观迥凌虚。日月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可能“长安”之名吉祥、富贵,又因西汉、隋、唐著名王朝皆建都于长安,名声兴隆,如入中天。故唐以后一些朝代仍常通称其国都为长安。唐李白《金陵》诗曰:“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晋朝南渡后

以建康(今南京市)为国都,建康古称金陵,故李白称金陵为长安。

有学者考证和统计,古代长安土地上经历过 13 个朝代,即“历史上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 13 个王朝曾在此建都。此外,汉末绿林赤眉起义、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也曾在此建立过农民政权。前后历时有 1 100 年,是我国七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的《陕西名胜古迹》记载:“‘长安自古帝王都’,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大夏、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都曾建都在这里,历时 1 087 年。”^[7]

上述不同的是“东汉(末年)”与“大夏”(赫连勃勃)政权在长安建都情况。据史书记载:赫连勃勃字屈子,为匈奴族铁(佛)部,是十六国时期夏的建立者,公元 407~425 年在位,初属后秦姚兴,弘始九年(407)拥兵自立,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号龙昇。凤翔元年(413)筑都城,名为统万(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东晋灭后秦时,他乘刘裕还军留子义真,攻占关中,在长安称帝,改年号昌武,继改真兴。公元 407 年匈奴贵族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建都统万城(今陕西横山西北)。他于公元 418 年乘虚夺取长安,即帝位,公元 431 年为吐谷浑所灭。在上述入主长安建都作君主的十三朝中,大致有 7 个为少数民族政权,其他汉族政权建造者实质上亦融入许多胡人血统。

自周朝开始,其王室臣民已从周边国家民族文化中吸收丰富营养。当时周代统治者继承“先王之制”,将其管辖地区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等“五服”,《国语·周语》中记载,“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亦将边疆的少数民族划在中原王朝领导的“五服”之中。《史记·匈奴传》中记载“武王发纣而营洛邑,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从中可知,西周统治者曾将“戎夷”胡族置于关中平原“泾、洛”一带。

秦人自秦岭深处走出崇山峻岭过程中,曾与周围毗邻的异族有过各种方式的交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穆公三十四年(前 626),西戎戎王遣使臣由余至秦,两年后则用其策“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为此,周伟洲教授在《陕西通史·民族卷》中进行了这样的科学阐释:“秦国称霸

西戎的过程,是其开疆拓土、日益强盛的过程,也是秦人及其所并诸戎逐渐融入华夏族的过程。……在春秋以后,秦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华夏族(周人)的文化礼仪,参与大国争霸,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而由秦人兼并的诸戎也随秦人一起融入到华夏族之中。”^[3]

两汉时期,今陕西汉中城固诞生了一位贯通中西胡汉的友好使者——张骞。他于建元三年(前138)应征出使西域,前后历时13年,成功地打通了中原政府与西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联络的道路;与此同时,汉廷又实施与异地胡族的和亲政策。元封六年(前105),汉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王猎骄靡,细君公主思乡悲歌,遂作著名的《黄鹄歌》。

秦汉时期,长安已是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统治阶级和广大市民的心目中,大一统的民族团结和睦的思想由来已久,并深入人心。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就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后来荀子于《荀子·正论》中发挥此观念,大力倡导“天下为一”。

隋唐太平盛世时期,长安繁华富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华夷、汉胡一家已形成社会共举的事实。唐太宗公开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8]此时中原王朝通过宣慰、安抚、侍子、赏赐、封爵、和亲等方式来加强与四夷之间的友善关系,以推行、继承和发展先秦以来先进的民族政策。也正是周、秦、汉、唐各朝代统治阶级的开放、开明、开拓政策,方使十三朝古都长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艺术等各项学科成就居于全国之首。

四、世界遗产丝路起点古都长安

在我们大张旗鼓地宣传古都长安,并将西安打造成国际化文化名城的同时,著名文学理论家杨义先生引人注目地提出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崭新观念,其主要的理论支撑点在于对中国西部文化与中华多民族文学的重新认识与估价。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民族与文化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世纪一些学力最深厚的历史学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都对这个问题倍加关切。……把56个民族的文学现象,放在一幅巨大的

中国文学地图中重绘,才能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夺目光彩,才能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出中华民族元气淋漓的创造能力。”

令人倍加鼓舞的是中国佛教史上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竟然有四宗发源于长安。关中大地众多辉煌寺观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也印证着儒释道交流与共处的和谐历史。轰动世界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在沉寂了1113年之后,于法门寺重回人间。开放的盛唐时代,佛教的兴盛没有阻遏其他宗教信仰的存在。在盛唐时代的仙风道骨和禅影佛光的交织中,我们看到的是华夏各民族源于心灵的智慧和自信。

中国是诗的国度,长安有诗的源头。诗情画意与文治武功交相辉映,文章灿烂同政治强盛、国力雄厚的汉唐文化紧相伴随。司马迁在汉长安城里写就的《史记》,标高了一代汉唐雄风。唐长安城的空气里洋溢着诗的因子,无数诗人在长安留下了他们最杰出的诗篇,比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王之涣等。唐诗的魅力,在邻国日本、朝鲜、越南引发汉诗热潮。这个时代,闻一多称之为“诗唐”。此称谓与司马迁、班固等铸造的“文汉”一起誉满世界。

关中和大西北人民酷爱的“秦腔”之名,相传出自唐明皇的宫廷。秦腔早已成为陕西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鲁迅先生从黄钟大吕般秦腔中听到了汉唐血液流淌的声音,感动之余特地赐赠了“古调独弹”赞誉匾牌。秦腔,连同来自陕西南部的汉调二黄,对京戏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陕西的土地上还诞生了与声腔戏曲相呼应的乐舞形象艺术形式,如皮影、老腔、阿宫腔、汉调桄桄、眉户、西安鼓乐等。尤其老腔朴实而高亢的唱腔,犹如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被赞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周易》云:“鼓之舞之以尽神”。从戍边将士那里流传下来的陕北安塞腰鼓,让民间音乐歌舞得到飞跃,成为祭祀仪式的极致。当男子们打起腰鼓闹秧歌时,女人们早已用窗花将喜庆和欢乐洒向世界。黄土高坡上的寻常日子,化作了“信天游”——那是一首书写在广袤天地间的抒情诗。翻过秦岭,便进入婉转多情的陕南民歌世界,其代表便是紫阳民歌。《诗经》中数十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在汉水的上游地区,这里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中国文学的历史与中国的“文学地图”确实是华夏炎黄子孙“56 个民族”常年累月共同努力而绘制的,是华夏各民族共同热爱和拥有的中国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与民间文学是其古老的渊藪。这些都可追溯到中原、三秦、关中腹地之中华故都长安。

五、结 语

总而言之,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地域浓缩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从周朝的丰镐二京到秦咸阳、汉长安,经五胡十六国,直至隋唐的长安,汉族与外来民族间的融合,始终以今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不断创造着人间奇迹。文化的融合不仅源于地理,而且也源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移民。长安古城以博大的胸怀拥抱天下英才豪杰,她将文才武略奉献给了华夏母亲。人类文明的力量,从这里出发惠及四方,源远流长,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当代,万世流芳。

近年,西安联合中外各地联合申办世界文化遗产而提出“世界遗产,丝路起点,古都长安”的口号,即推出长安文化这个学术大概念。“长安文化”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需要持之以恒、长期积

累、合力完成的重大系统工程。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十三朝古都长安因为中华各民族原始文明发源地而贯穿古今,又因为丝绸之路起点向四处辐射而闻名中外。

参考文献:

- [1] 洛天驤. 类编长安志: 卷一[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周伟洲. 陕西通史·民族卷[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4] 韩康信. 中国新石器时代种族人类学研究[C]//田昌五, 石兴邦.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51-54.
- [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建国三十五年来陕西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J]. 考古与文物, 1984, 4(5): 35-45.
- [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名胜古迹[M]. 西安: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1981.
- [7] 张建忠. 西安旅游十大景[M].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9.
-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Discussion on the long-standing Chang'an culture and Chang'an learning

LI Q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long-standing Chang'an culture has constituted the firm basis of the splendid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as, at present, bee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by the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of its constitu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aws and its potential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Xi'an was the capital city in the 13 dynasties such as Zhou, Qin, Han, Tang and so on with its important academic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s it has its peculiar geographical location, l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arge-scale exchang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it is always well-known in its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ffairs, culture, religion and arts not only in the whole country, but also in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Chang'an; Chang'an culture; Chang'an learning; Chinese civilization